

## 哲學：為建立臺灣做為未來華人世界的新雅典而努力

林遠澤\*



當代新儒家徐復觀與牟宗三都曾任教於東海大學，因而當我在上個世紀八〇年代晚期就讀東海大學哲學系時，基本上即沉浸在新儒家的學術氛圍中。新儒家致力於中華文化的復興，而在方法論上則強調中西哲學的會通。這對我的學術研究方向有很大的影響，因為從那時開始，我無日不思考的問題，即在於應如何理解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所在，以及如何能為中國在現代的挫敗，找到未來文化發展的出路。經歷三十年多來曲曲折折的探索，直到現在，對於這些問題，我才慢慢能將我的看法表達出來。這次能獲得科技部傑出研究獎的獎

---

\* 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教授

勵，我因而首先必須感謝在這一路上護持我成長的師友，以及學界對我目前尚嫌微薄之研究成果的肯定。

在學術的分工領域裡，我一向沒有被歸類為中國哲學的專業研究者，而我的確也不具備那樣的資格。之所以心嚮往之，但力不能至，主要是因為我一直認為，如果我尚未能「一口吸盡西江水」的話，那麼我如何能找出中國哲學有別於西方哲學的核心內涵與思維特色所在。是以當我在大學時代通讀唐（君毅）、牟、徐等新儒家諸先生的大作，並從中獲得很大的精神感召與思想啟發之後，我還是隨即就轉向西方哲學的研究。從柏拉圖、亞里斯多德到康德、羅爾斯、現象學，自此一頭栽進西方哲學二千多年的浩瀚汪洋中，一去不返。我在研究所碩士班階段，就讀的是第一年新成立的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當時我的碩士論文研究的是「黑格爾的社會存有論」（在很多年以後，我才知道這個論文題目與我大學親炙的授業老師蔣年豐教授的博士論文完全一樣，雖則他談的是黑格爾的法哲學，而我談的是精神現象學。蔣師英年早逝，此後未有機會再求教論學，遺憾長留）。

在臺灣，我在西方哲學方面的興趣，受當時師長的影響，主要在於德國觀念論與現象學。但當我在 1999 年獲教育部公費留學獎助，赴德國柏林自由大學攻讀哲學博士學位後，我卻發現德國學界的哲學研究興趣，已經有相當大的轉移。特別在哲學的語言轉向後，如何透過語言溝通取代以意識為主體的哲學典範，成為當時學界主要的思考議題。我在柏林自由大學躬逢其盛，因而在德國留學期間，主要研究以德國哲學家阿佩爾與哈伯瑪斯為代表的語用學——溝通行動理論。

取得學位回臺後，我先後任教於南華大學哲學系、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與政治大學哲學系。期間致力於擴展與拓深有關溝通理性與責任倫理的研究。特別是近年來，我一方面上溯溝通行動理論在德國古典語言哲學傳統中的理論根源，另一方面則下探溝通行動理論與對話倫理學在當代社會中的具體應用。最後再與中國哲學進行比較，以闡發儒家哲學的現代性向度。其具體的研究成果，結集成我最近接連出版的三本專著：《關懷倫理與對話療癒——醫護人文學的哲學探究》、《儒家後習俗責任倫理學的理念》、《從赫德到米德——邁向溝通共同體的德國古典語言哲學思路》。這三本專書分別代表我在「應用倫理學」、「中國哲學」與「德國古典語言哲學」三方面的研究成果。

以我研究德國古典語言哲學所闡發的溝通共同體理念為基礎，日後我將在一方面，進一步撰寫一部以溝通理性為基礎的實踐哲學專書，書名暫定為「哲學做為民主的溝通與團結——當代實踐哲學的對話理論定向」。這部專著將梳理從

亞里斯多德的修辭倫理學到德國法蘭克福學派的承認理論之間的發展，以回應有關康德的「道德性」與黑格爾的「倫理性」之間的爭議。若能解決這些問題，那麼有關儒家內聖外王的理論體系，就有重新建構的理論基礎。對此我將接著在《儒家後習俗責任倫理學的理念》一書探討儒家倫理學的觀點之後，進一步以《儒家禮治國原則》的專著，來探討儒家的政治哲學觀點；在另一方面，我在《從赫德到米德》一書的附錄中，已經開始展開我對於漢語與漢字之語言世界觀的探索，假我以數年，我希望能從「漢字思維與文字學的哲學」的向度，對中國文化的符號形式基礎，進行再深一層的探究。

當然，說來好笑，有時我自己也不禁莞爾，孫悟空似乎逃不出如來佛的手掌心。我現在正在撰寫「哲學做為民主的溝通與團結」這一本書，在這本書中我又回到我在碩士論文中所探討的黑格爾社會存有論。繞了地球一大圈，年亦過半百之後，我的研究終究又回到最初接觸哲學時，透過新儒家拋給我的，關於內聖外王這些最基本的儒學問題。我只能啞然失笑，顯然我終究還是大一那個狂簡地不知所以裁之的小子！

學術應是一種生命，而不僅是一種工作。研究應是一種使命，而不僅是一種興趣。學術研究的問題，至少就哲學來說，絕非只是如何選定研究議題、撰寫專題研究計畫之類的問題，而是我們應該深切關注哪些人類或民族文化所面臨的重大問題，而思索解決之道。如此的研究的成果，才會是真正有意義的貢獻。當前雖然很遺憾的，哲學研究愈趨門前冷落車馬稀。但一個國家，若不能找到一批人，能為文化的根源問題，進行深入的哲學思考，那麼一個沒有文化靈魂的共同體，就既缺乏內部凝聚的力量，也對未來的發展盲目。但相對地，今日的哲學研究也應負起更多的社會責任。我們的哲學研究，真的不能再只滿足於引介西方學說，或在所謂的國際化中，被整合到西方的學術體系中，只談在別人界定下的哲學問題，或只研究在別人的社會文化中產生出來的議題。而應勇於思考自己的歷史文化與生活世界所產生的問題，以免真的被社會邊緣化為無關緊要的、聊備一格的「基礎研究」。哲學不應冷門，哲學在今日應致力於攜手臺灣的民主與科學，為建立臺灣做為未來華人世界的新雅典而努力。我們能以此自期，臺灣的哲學研究風氣才會再有復興的展望。